

朱熹与闽学思想 研究

黎昕◎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朱熹与闽学思想研究

■ 黎昕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熹与闽学思想研究 / 黎昕著. —北京: 中国书

籍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068-3601-2

I. ①朱… II. ①黎… III. ①朱熹 (1130~1200) —

理学—研究 IV. ①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6188 号

朱熹与闽学思想研究

黎昕 著

责任编辑 刘路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艺海晴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601-2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朱熹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宏富的著作、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思辨，建立了集大成的理学思想体系，他和他的弟子创建了闽学——朱子学。他的学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既承载着传统又启迪着后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朱熹思想学说不仅对我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对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欧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一些学者视为东方文化的重要表征。

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其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历史地位为众所公认。但朱熹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本。朱熹学说作为儒学复兴和发展的必然产物，既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创新，同时又包含了对佛道思想的扬弃。朱熹的闽学与周敦颐的濂学、程颢程颐的洛学、张载的关学同为以地名代表人名标明的宋代理学的一个流派，同时，它又与濂学、洛学、关学和邵雍的象数学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闽学是以二程学说的基本思想为中心，改造了周敦颐的宇宙图式，吸收了张载的气化思想，融合了邵雍的象数易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精密理论创造的结果。而在这种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杨时、罗从彦、李侗等人则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

用。当时，杨时不仅是程门四大高足之一，被后世的清康熙帝称为“程氏正宗”；同时，他又是“南渡洛学大宗”，对于推动洛学在东南的传播、促进福建文化的开发和我国文化重心的南移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黄宗羲说：“龟山（杨时）三传而得朱子，而其道益光。”全祖望说“杨文靖公（杨时）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并肯定朱熹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朱熹正是通过杨时、罗从彦、李侗这样的师传，才实现了从洛学到闽学的过渡，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杨时、罗从彦、李侗也就不会有朱熹。杨时、罗从彦、李侗的贡献除了传续洛学外，还为朱熹闽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做了重要的准备。如杨时等关于“太极”“理一分殊”“即物穷理”“默坐澄心”等思想以及理欲观、人性论、历史观等，都为朱熹思想的形成与成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又如朱熹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也与杨时等有着一一定的关系，朱熹在书中引述了杨时之论达七十三条之多，说明杨时的思想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因此，探究朱熹与闽学思想的学术渊源脉络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着力点是试图对朱熹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作一探索。明初方孝儒说：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笃其行，而审于义理之辩”。朱熹与闽学思想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是现实社会的需求。它是朱熹及闽学学者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的心灵之间融突和相互交往活动的体认。如何把伦理道德从形而下的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的层次提升为形而上的理论思维形态层次，对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的理论前提、基础和来源进行探究，从而使其获得理论思维形态的支撑和论证，这是朱熹等理学家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在朱熹那里，理是伦理道德行为的理论前提，君臣、父子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来源于理，他还把三纲五常天理化，认为理（天理）“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天理成为世俗的人伦关系及其由此构成的道德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不仅

使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获得了形而上学天理的有力论证，跃进到道德哲学或道德的形上学，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和理气、道器、天地之性气质之性、道心人心、王霸、义利、理欲等关系中。在朱熹的思想理论体系中，不仅对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而且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生命形态也有一个相当透彻的了解，蕴藏着极其深刻和丰富的生态思想。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重视朱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对于启发当代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思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本书尝试进行了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朱子与闽学思想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拓展和深入，本书对当今海内外朱熹与闽学思想研究及其方法也作了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任务。但无论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和谐文化的构建，还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的建设，文化发展活力的增强，都离不开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都离不开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尽管朱熹所处的时代与我们不同，其思想学说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他提出的不少主张和重要理论不仅对于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统一、调整社会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当代，它对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仍具有独特的重要价值和启迪意义。朱熹思想作为我国和世界珍贵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包含的合理思维、积极因素，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动力，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和和谐世界的构建。“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既珍惜宝贵遗产，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又紧跟时代步伐，开拓创新，这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让我们共同努力，进一步把朱熹与闽学思想研究推向深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

目 录

一、杨时理学思想及其影响	1
道南第一人——杨时	2
杨时“理一分殊”说的特色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15
从《四书集注》看朱熹对杨时理学思想的批判和继承	24
论杨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38
二、闽学思想渊源及其历史地位	49
福建文化的发展与闽学的产生	50
闽学是儒学复兴和发展的必然产物	65
论闽学对佛学思想的扬弃	80
闽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	98
闽学与周敦颐的濂学	106
闽学与二程的洛学	112
闽学与张载的关学	125
闽学与邵雍的象数学	133

“南剑三先生”与闽学	141
武夷胡氏家学与朱熹思想的形成	158
闽学的历史地位与当今价值	167
三、朱熹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187
朱熹的道德修养方法论探微	188
朱熹理欲观评析	196
朱熹伦理思想研究	211
朱熹的生态智慧与现代意义	247
朱熹对儒家忠恕思想的阐发及意义	258
台湾朱熹研究	267
试论朱子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	273
当代海外的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	279
纪念朱子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298
后 记	302



杨时理学思想及其影响



道南第一人——杨时^①

史称“南渡大师”的杨时，是两宋时期“洛学”和“闽学”的中介人物，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特别是他从理论和实践上承上启下，对北宋理学的南传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国外不少理学研究者屡屡提及。但在我国，对杨时尚缺乏研究。为此，本文试就杨时的生平及主要传道活动和理学思想，以及他与“闽学”的渊源关系作一些肤浅的探讨。

一、南渡洛学的大宗

杨时，字行可，后改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省）人，因隐居龟山，亦称龟山先生，生于1053年（宋仁宗皇祐五年），卒于1135年（高宗绍兴五年），官至龙图阁直学士，享年八十三岁，谥文靖。

杨时生活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北宋之交。一方面，由于官僚大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北方辽金贵族统治者频繁地对中原进行掠夺性的战争。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宋王朝的统治。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现实，不少地主阶级思想家都在研讨救治的方案。由于他们在地主阶级内部所属的阶层、派别、集团不同，因而，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和以司马光、二程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斗争，就是这

^① 《福建论坛》，1982年第6期。

种矛盾的表现。伴随着这种斗争，在思想上则出现了“新学”和“道学”的对立。“道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佛道，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为封建统治提供了哲学论证。它较之以前的儒、佛、道，都更加精致、圆滑，也更加适合于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对内压迫、对外屈辱的现实政治需要，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而出现了南移的趋势。杨时正是在这种客观历史条件下，身负强化封建统治的使命而传道东南的。

杨时的政治思想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求学阶段。杨时的祖先，原是弘农（今河南省境内）望姓。五世祖于唐末迁居福建将乐，“为农家”。至杨时之父，“始励其子以学”。^①杨时自幼聪颖，八岁能文，十五岁游邵武学，攻书多年。二十一岁补太学生，回乡讲学于含云寺，广泛涉猎了佛老列庄的许多典籍。在含云寺的两年中，他和寺内庆真和尚交往甚密，“与真师游非一日”，“听其言，考其所知，益信其贤”，“始恨不得相从”^②，企图从佛学中寻找修身治国的道理，所以程颢说杨时“始为佛氏之学”。^③

1076年（熙宁九年）杨时二十四岁，中进士，授汀州司户参军。但他“屏居不仕”，“自蔽曲学”，“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④二十八岁赴调京师，接触洛学，从此开始了由佛入道（道学）的转变。他在《见明道先生书》中说：今“调官至京师于朋游间，获闻先生之绪言，鄙俗之心，固已潜释，于是慨然兴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远矣，尚或诵其诗，读其书，论其世，想见其为人而师之，又况亲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复矣，此区区所以有今日之请也”。^⑤于是，1081年（元丰四年），二十九岁的杨时特至颖昌拜见二程，以师礼事，皈依了程门。

①《杨龟山先生集》，卷二十九。

②《杨龟山先生集》，卷二十四。

③《福建通志·游醉传》。

④《杨龟山先生集》，卷十六。

⑤《杨龟山先生集》，卷十六。

杨时由佛入道，并非偶然机遇所致，而有其时代和思想的必然性。理学和佛学虽都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但理学依据儒家传统观点，取积极的“入世”态度。它的理想境界就是按儒家原则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王国：既反对被压迫者对封建秩序的反抗，也反对统治阶级内部不按儒家原则办事。杨时深知理学较之于佛学，更符合于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政治上、思想上统治的需要。所以他说：“儒佛深处所差秒忽耳，见儒者之道分明则佛在其下矣，今学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明吾道之大也。”^①这就是杨时由佛入道的原因所在。

杨时入程门后，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成了程门高足。他先学于程颢；程颢死，又从程颐，留下了“程门立雪”的佳话。在程颐“以罪流窜涪陵，其垂言立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②，士大夫之间盛行佛学的情况下，杨时仍跟“洛学”不变，因而受到了程颐赞赏：“学者皆流于夷狄（指佛学）矣，惟有谢（良佐）杨（时）二君长进。”^③杨时的诚心穷究，使他对洛学有着高深的造诣。李侗谈及罗从彦从学于杨时的情形说：“罗先生少从审律先生吴国华，后见龟山，乃知旧学之差，三日惊汗浹背，说几乎枉过了一生。”^④朱熹的朋友张栻说杨时得二程的心传之妙，“苟非其人，差毫厘而千里谬矣”^⑤。胡安国在《龟山先生墓志铭》中写道：“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传之道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在南方则广平游定夫，上蔡谢显道和公（杨时）三人是也。”^⑥

倡道阶段。杨时学成南归，程颢目送他说：“吾道南矣！”^⑦寄予

①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

② 《杨龟山先生集》，卷二十五。

③ 《伊洛渊源录》，卷十。

④ 《杨龟山先生通纪》，卷二。

⑤ 《二程集》，第1167页。

⑥ 《杨龟山先生集》，卷二。

⑦ 《伊洛渊源录》，卷十。

他极大希望。杨时南归后也实现了程颢的预言。全祖望《宋元学案》说：“明道喜龟山，伊川喜上蔡，盖其气象相似也，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出。”^①

杨时传道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书传世。杨时既致力于编辑二程语录，也自己撰书立说。在编辑二程语录过程中，他并非实录直说，而是述而有作，“变语录而文之”。他用较文雅的语言将二程（主要是程颐）的语录改写成《河南程氏粹言》。其论道、学、书、政、韦、天地、圣贤、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涉及二程性理学义的有二十余个范畴。在内容和结构上也保持着哲理、伦理和政治三者合一的形态，一如二程。其中，“道外无物，物外无道”，从本体论上为封建伦理道德进行论证，则是二程的真正道路。后来《粹言》作为附录和朱熹编辑的《遗书》一起，被收在《二程集》中，累传至今，所起作用相当之大。杨时还通过自己著述，把从二程那里师承下来的思想融汇贯通，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表述，传给后学。其著述，据《将乐县志》记载，有《学庸语孟解》《易诗书礼解》《周礼解》《经筵讲义》《易春秋》《孟子义》《校正伊川易》《三经义辩》《辩字说》《目录论》《列子解》《庄子解》《诗集》《时集》《杂著》等。这些著述后来大部分被其裔孙杨绳祖收在《杨龟山先生集》中，是我们现在研究杨时的第一手资料。

另一方面，杨时利用学者和学官这种一身二任的条件，通过民间办学和官学的渠道以学传世。他辗转东南，设置书院，聚徒讲演。常州、慈溪等地的龟山书院都是他授徒讲学之所。明代极负盛名的东林书院，也原是他曾经讲学过的地方。顾宪成在《请复东林书院公启》中说：“有宋龟山杨先生受业二程夫子，载道而南，一时学者翕然从之，尊为正宗。考锡乘，先生常讲学是邑十有八年，建有东林书院。”董必武同志1962年视察东林书院旧址时，对杨时的讲学活动，曾题诗赞曰：

^① 《宋元学案》，三十五。

“东林讲学继龟山，高顾声名旧史传，景仰昔贤风节著，瞻楹履闾学弥坚。”除了通过书院聚徒讲学外，杨时还利用官学来传播道学。他任荊州州学教授时，曾多次答胡文定问学书，“文定亲承指授，以之而传春秋”^①。晚年任国子祭酒，极力提倡道学。即使在主持浏阳、余杭、肖山三县之政事时，也“不忘秉教，一州人材彬彬辈出”^②。

二、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

杨时作为一个中介人物，对各种学派的思想进行了兼收并蓄。他的思想体系是多方面的、充满矛盾的。但是，在其哲学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对二程理学的师承和发展。

第一，关于“理”的思想。

真正把“理”作为哲学最高范畴，始于二程。在二程看来，“万物皆是一个天理”，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从而把封建的伦理纲常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

杨时继承了二程思想体系中的这个核心，认为“理”是宇宙的最高原则。它先天地万物而存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所以说“盖天下只是一理”^③、“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幽明本一理”^④，天地间精气的聚散变化，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都本于这个理。杨时阐发了程颐“心、性、天只是一理”的思想，他把性分成“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理”，故善。至于气质之性，可以为恶，乃是反常。“人所质稟，因有不同者，若论其本则无不善，盖一阴一阳之谓善，阴阳无不善，而人则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

① 《杨龟山先生通纪》，卷一。

② 《杨龟山先生通纪》，卷一。

③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三。

④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一。

有时而恶矣。犹人之生也，气得其和，则为安乐人，及其有疾也，以气不和，则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言气质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刚柔缓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谓天地之性。”^①天理在人为性，性即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命道三者一体而异名，初无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②，“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③“天理即所谓命”，^④性、命、道三者都是同一个天理。

在论述天理产生万物的过程中，杨时吸收了张载“气”的思想，以天地万物皆为一气，气聚成物，气散物灭。“乾阳物，坤阴物。”乾坤也就是阴阳二气。“天地乾坤亦是异名同体，其本一物。变生则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此物也。”^⑤“夫通天下一气耳，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虚常流通天地。”^⑥人和万事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二气的动静屈伸而变化出来的。就这而言，他似乎与二程不同。二程对张载的《西铭》推崇备至，但反对张载的世界观，尤其是“气”的学说。二程认为张载作为万物之源的“气”，只不过是物质性的“器”，还不是形而上的“理”。他们还批评张载“形聚为物，形溃反原”之说，认为“气”有生有灭，只是由理产生出来的一种暂时性的东西。杨时则不同，他把“气”看成是永恒的不断运动变化的东西，“其盈虚常流通天地”。这是他思想体系中闪现出的一丝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光辉。但是，不能据此就认为杨时是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者。因为在他那里，“气”终究还是居“理”之下的第二位的東西。他认为天地阴阳，四时变化，万事万物归根到底都是由本无定位的“太极”（“理”的同

①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二。

②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二。

③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一。

④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二。

⑤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三。

⑥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三。

义语)所产生,“两仪、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有四维,皆自然之理也”^①。“气”不过是“理”产生万物的一个环节而已。唯物主义的闪光终究被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杨时还认为这个理贯串于一切事物之中,“有物必有则,物即是形色,则即是天理”^②。但这不是说每一物各有自己的理,而是说每一物都由理产生,每一物也就体现了完全的理。所以说:“一以贯之,只是一个自然之理。”^③他说:“《西铭》只是发明一个事天的道理,所谓事天者,循天理而已”。^④《西铭》阐述的事亲事君的封建道德原则就是天理的体现,“不循天理之正者,非圣贤之道也”^⑤。所以,他要人们顺“性命之理”,去尽私欲,“人各有胜心,胜心去尽而惟天理之循”^⑥。这样封建等级秩序就能巩固,“因时乘理”,“天下国家安利也”^⑦。显而易见,杨时这里所说的“理”,乃是一个“充塞宇宙之间”,“本无定位”但又能化生万物的精神实体,这个精神实体实际上也就是封建的伦理纲常。

第二,关于“理一分殊”的思想。

明确把“理一分殊”作为哲学范畴,始见于程颐和杨时关于《西铭》的讨论。《西铭》把事亲事君的封建关系和天人之间的自然关系等同起来,认为天地君亲都是绝对不可违背的,为封建的等级秩序提供了哲学的先验根据,因此甚受程颐之推崇。但《西铭》中“尊高年”至“无告者”,就其形式而言,似乎有类于墨子的尚同和兼爱说。杨时曾怀疑这段话接近墨家,“《西铭》深发圣人之微意,然言体而不及用,

①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三。

②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三。

③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三。

④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三。

⑤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二。

⑥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二。

⑦ 《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一。